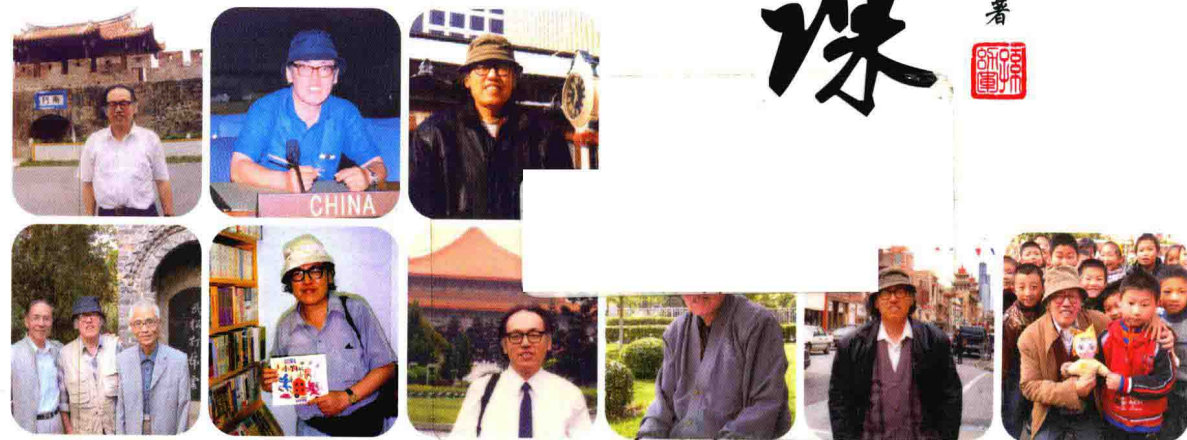


YESHI RENSHENG YIKE

主 编：高洪波
副主编：束沛德 金 波

也是人生一课

孙幼军◎著



ZHONGGUO ERTONGWENXUE DAJIASUIBI SHUXI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主 编：高洪波
副主编：束沛德 金 波

ZHONGGUO ERTONG WENXUE DAJIA SUIBI SHUXI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也是人生一课

孙幼军◎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也是人生一课/孙幼军著. —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1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ISBN 978-7-5395-4485-4

I. ①也… II. ①孙… III. ①儿童文学—随笔—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9890 号

也是人生一课

——中国儿童文学大家随笔书系

作者:孙幼军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350001)

经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区 B 区 42 幢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227 千字

印张:14.5 插页:3

版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5-4485-4

定价: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目录 Directory

第一辑 最初的记忆

杏黄色的小枕头	3
一盘花式蛋糕	5
悔	7
弟弟是从哪儿来的	10
桃园的大鸡和小鸡	13
两个讨厌小子	16
小黑	20
草帽事件	25
光腚大会和遗书	31
老头儿和担子摔一跤	36
我的黑驴	40
我当“小书迷”的日子	44
小影迷兼小歌手	49
逃难记	54

第二辑 亲情·友情

我的不周山	67
好人一生平安	74

我的书呆子大哥	77
我家毛毛	82
家有小女	91
我有个二弟叫幼忱	96
我的好朋友樊发稼先生	100
老师和朋友——忆文井师	102
话说我与之路的友情	109
送别至善老师	111
忆念张美妮	116
三位当年的小读者	119

第三辑 生活·闲趣

冰上翱翔的日子	125
可怜的蛇	131
经理专用车	137
“小坦克”的新贡献	142
走马上任——“洋教头”手记 (之一)	146
冰块变苹果——“洋教头”手记 (之二)	150
一等秘书官白先生——“洋教头”	

手记（之三）	154	给保冬妮（两封）	196
旅美随笔	161	给梅子涵（两封）	199
你瞧瞧这个头儿！——渔友趣事录		给王一梅（两封）	204
（之一）	169	给董宏猷	208
踩上地雷了——渔友趣事录（之二）		给黄幼芬	210
.....	172	给郁雨君	212
要面子，不要鱼——渔友趣事录		给严文井（两封）	215
（之三）	174	给阿甲	218
也是人生一课	177	给单瑛琪	220

第四辑 书 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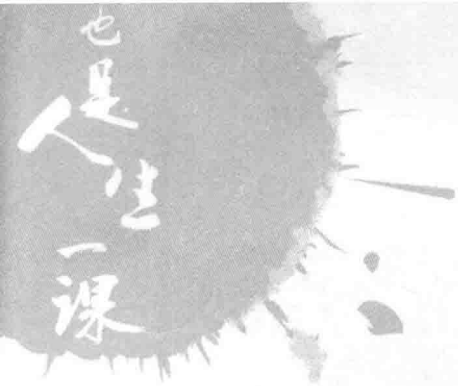
给樊发稼（两封）	185
给孙绍振	192

附录

附录一：永存童心孙幼军	222
附录二：舍教授而取童话	225

第一
辑

最初的记忆



杏黄色的小枕头



地板上有一抹黄色的阳光，好像是中午。

妈妈躺在床上，睡着了。

床很高很高。我踮起脚、伸长胳膊，抓住妈妈头下的枕头，用力扯。

妈妈被扯醒了，睡眼惺忪，喃喃地说：

“别闹……”

什么“闹”啊？那个杏黄色的小枕头是我的！

我又扯，一边叫：

“给我！给我！”

妈妈又被扯醒了。她不耐烦地抽出枕头，丢给我。

我急忙把我的枕头抱在怀里，搂得紧紧的。

妈妈晕忽忽地伸出一只手在床上摸。她一定是想摸到另外一个枕头。

可是她什么也没摸到，又睡着了。

妈妈那只手就那么伸着，而且，没了枕头，她的脖子歪着，头发还披散在脸上。看那样子，她一定很不舒服。

我站在床前看着妈妈，心里后悔起来。

要是妈妈这时候醒了，我会把枕头送上去，说：

“给你！”

但是妈妈不醒，头还是那么歪着。

妈妈真可怜……

我抱着枕头站在那儿，哭起来。

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还留在我记忆里。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我根本不会知道还有过一个属于我的小枕头，不会知道它是杏黄色的。

妈妈十九岁时生的我。那一年，妈妈该是二十一

岁。相比起劳累的妈妈，我女儿二十一岁的时候正读大学，很贪睡。

我心里就这样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歉疚。明知妈妈绝不可能记得那件事，但我却依然还想提起它。

后来我已经是 W 学院的教员了，有一年妈妈到北京来，随身带着个小相册，拿给我看。有一张是我站在床上，扶着比我高出一个头的铜栏杆。我说：

“啊，就是这一张床！”

虽然床只到我膝盖，但我那时却觉得它高不可攀。我乘机向妈妈讲起杏黄色小枕头的事，连同我的忏悔，还摇头苦笑：

“一次私有观念的大发作！”

妈妈说：“你小时候，挺懂事的。”

她的意思好像是讲，根本不可能有那种事。

这实在比不记得还要糟。

我“懂事”是后来有了妹妹，接下来又有了二弟、三弟、四弟。他们不只用我的枕头，还穿我的衣服，拿走我的玩具和故事书。事情一直发展到：

“就这么两个啦，给弟弟吧！”

我的私有观念，是被弟弟妹妹们打破的。



一盘花式蛋糕



爸爸和妈妈各牵着我一只手，走在人行道上。人行道上的积雪被路人踩得坚实而光亮。我时不时蹲下来，让爸爸妈妈弯身拉着我滑冰。

哈尔滨严冬的傍晚，连空气都像是被冻得凝固了，我却折腾得浑身燥热。爸爸妈妈在一个明亮的大玻璃窗前停下来，指着橱窗里几个穿皮大衣的“木头人儿”议论着。我闲得无聊，抚着横在大玻璃前一条很粗、很长、锃亮的铜扶手跑来跑去。

我从头到脚，给捂得严严实实。我的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巴掌”，还有一条细带子连接着。要是想领略一下铜扶手的清凉，最方便的办法大概只有把舌头伸出去，舔上一舔吧。

我就真那么干了。

这时发生了我完全没料到的事：我的舌头立刻牢牢地粘在大铜管子上。我惊慌地一挣，舌头是扯下来了，一块皮却留在了铜管子上面。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爸爸妈妈双双跑过来，其中一个抱起我。他们不知道，我感到世界已经在这刹那毁灭了。商店，路灯，汽车，连同跑上来的爸爸妈妈都一齐消失了。眼前剩下的只有一大片可怕的红色——我嘴里流出的鲜血。

凭着自己的过失，我博得一份额外的爱怜。

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妈妈把我领进了一家俄国咖啡馆。屋里很幽静，只坐着两三个人。桌面是玻璃的，椅子像火车里的座位——有高高的靠背。

躲在那后面，没人看得见我。

穿白上衣的侍者端来一杯袅袅上升着一缕白气的牛奶，还有一大盘漂亮的、香喷喷的小蛋糕。

妈妈笑着把牛奶和蛋糕都推到我面前，拿起锃亮的小匙子放在我手里。

那盘点心真诱人啊！小蛋糕有长方形的，有三角的，有圆的，下面都有个花边儿的白纸托托儿。蛋糕上面挤着各式各样的奶油花朵，有一块，黄花朵中间还嵌着个通红的樱桃。我常在“秋林公司”的玻璃柜里见到这东西，每次都是妈妈用力扯住我的手，我才肯离开。

现在，它们就摆在我面前，那么大一盘子！

可是，我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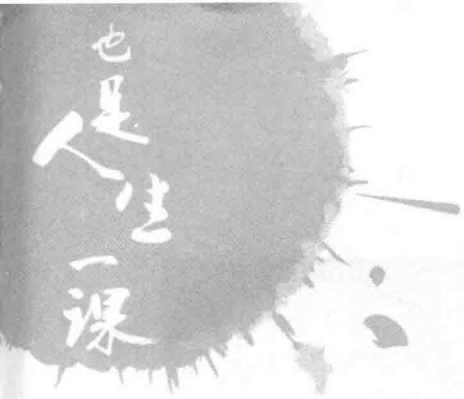
终于，坐在我对面的妈妈也眼泪汪汪的了。

妈妈说，那一年我三岁。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不如意的。前几天我向一位偶然碰到的老同学发感慨，说那会儿看见烧得红彤彤的肘子真馋啊，就是没钱买，昨晚老伴儿烧的那个大肘子看上去极好，却没胃口吃了。老同学笑了，说：

“正是俗话讲的：有牙没豆儿；有豆儿没牙！”

我同那盘令我怀念的花式蛋糕也是这样的。





儿时，我居住的那座城市里有许多白俄^①，几乎和中国居民一样多。哈尔滨那会儿被称作“东方莫斯科”，大概不独因为有成片的俄式房屋、街道和南岗的大“喇嘛台”（当地人这样称呼教堂）。人们称那些白俄为“老毛子”或“穷老毛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从事既劳累又没多少收入的劳动，像扫大街、送报、收废品、穿上花制服站在商店门口，恭恭敬敬地给进出的顾客开门等工作。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善关系，跟那些在“日满提携”口号下装出一副笑脸，却又在骨子里把中国人当做奴隶的日本移民完全是两类人。性格淳朴的“老毛子”即使行乞，也想给施舍者一些回报，并不像中国乞丐那样只管伸手要钱。在爸爸遗留下来的摄影作品里有一张《流浪盲乐师》，那上面是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老毛子乞丐。人行道上两个衣着整齐的娃娃的背影，是我和妹妹。我们伫足，望着那位靠墙坐着，正在拉“巴扬”（一种圆按钮式手风琴）的白俄盲乞者。他的“巴扬”上固定着一只很小的罐头盒儿，是预备给过路人投硬币的。看来他根本就没指望谁会给他钞票。他脚前的路面塌陷下去一片，夕阳在路面和他体侧绘上了一条又黑又粗的电杆阴影，更显出他处境的凄凉。

那年我四岁。记忆中完全搜寻不出盲乐师和我们那次上街的影子。但我却清清楚楚记得另一个“穷老毛子”，一位给我们送牛奶的白俄胖大娘，尽管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岁。

^① 白俄：指二十世纪上半叶流亡于中国的俄罗斯难民。

每天晚上妈妈都把一个空“玻璃棒子”摆在门口的木头台阶上。那是一种大号的瓶子，容量相当于现在的三只啤酒瓶，日本人用它装酱油，装清酒，老毛子却只用来装牛奶。一大清早那位送牛奶的胖大娘就来了。她推开我们绿色矮木栅栏上的小门，提着个沉重的铁皮牛奶桶，摇摇晃晃地走到台阶前，把一只漏斗放在大玻璃棒子上，提起牛奶桶向里灌。我觉得那是件好玩的事，常常跑出来看。白俄胖大娘很傻，总力图把奶灌得齐瓶口，这就难免有时会溢出来。我站在一旁，盼望着那些白浆泛滥，好找到一次开心大笑的机会。不慎溢出了，她就会放下大桶，喘着气跟我一起笑。我那时也真莫名其妙，总是一见她笑，自己立刻就不笑了，还有些生气。



我不喜欢她跟我一起笑，还不喜欢她接近我。她的头发是黄的，眼睛是蓝的，胖脸上还有许多细毛毛。这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她衣衫褴褛，披肩上有破洞，可是很干净，连围裙上都没什么污渍。我没有理由反对她接近我，但我就是反对，并且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自己可以随便靠近人家，看人家在做什么，却不许人家靠近我，看一眼我在做什么呢？

她不知道我的毛病，送牛奶时只要看见我，匆匆忙忙之中总要向我打招呼，说“杜拉斯基”，然后凑近我，拍拍我的头，甚至摸摸我的脸。她手上有许多小刺刺，摸在脸上很不舒服。

一天早晨爬起来，我从窗子里看到外边一片白色，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就闹着要出去。妈妈把我穿得像个豆包儿，然后就放我出去了。很不巧，我刚跑出去，就看见那个白俄胖大娘提着牛奶桶，趑趄趑趄地走进院子。可能几天没见

了，她显得非常高兴，放下牛奶桶，竟把我抱起，在我脸上亲起来。这太过分了！我叫喊着，从她身上挣扎下来。她一手揪住我，一手从怀里掏出一小片包装得很漂亮的巧克力，塞进我手里。我怒气未息，一下子把巧克力扔进雪地，又朝她身上使劲啐了一口唾沫——这是我那时候的战斗方式，与同伴打架，我都是这么干的。

结果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白俄胖大娘突然僵住了，笑容还留在她的圆脸上，可是一双蓝眼睛突然亮晶晶，两颗很大的泪珠滚出来。她哭了，这是我朝她啐唾沫引起的！我心里非常慌，她抓着我的那只手一松开，我就立刻转身向后院逃去。

好像是，一连好些个早晨，我都不敢到院子里去。我躲在窗后偷看，想知道她怎么样了。看见她从四轮平板大马车上抱下一个奶桶，吃力地提向我家院子，我心里充满悔意。我真想跑到院子里去，走到她身旁，摸一摸她的手。我想告诉她，我啐她是错误的。我还想说，不是我讨厌她，是因为我除了妈妈，谁都不让抱。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什么都没有做，直到她的身影永远消失了，送牛奶的换成了一个带着小檐儿帽的大红胡子。

在我惹哭她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再没有接近我。她准认为我躲避她是因为讨厌她，她不知道我是不好意思。她不知道我后悔了！

她很穷，巧克力很贵，那是她宝贵的爱心。然而我却把她的爱心丢在冰冷的雪地里，还踩上一脚。

这一切不是不可挽救，而是我放弃了挽救的责任。其实挽救并不难，只用像我想过的那样，走上去，摸一下她的手，对她来说，这就足够了。那颗心会立刻热起来，像原先一样欢快地跳动。

但我没有。于是，我在自己心灵的上空涂上了一层悔恨的灰云之后，又涂上了第二层。它像铅一般浓重地悬在那里，再也抹不掉。

弟弟是从哪儿来的



据说我出生在哈尔滨南岗沙沟街，那一带是哈尔滨白俄居民密集的地区，那里有我爷爷年轻时买的一座俄式宅院。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在那里长大，直到结婚和生儿育女。小时候我常听爸爸和叔叔、姑姑们谈论沙沟街，他们提到这三个字的时候总是充满亲切和怀念之情。可惜铁路花园旁那座老宅对我来说只是个空中楼阁，它在我的想象中一会儿是这样，一会儿又变成那样，如梦幻一般。

我最初的记忆只同海关街四十号联系着。四十号也是一座俄式宅院，不过要小得多。院子四周有绿色的木板条栅栏包围着。临街的那道矮栅栏从坡顶一直延伸到坡底，里边围的并不独是我家。东邻和西邻各有一座房子，但中间有更高的绿栅栏板隔开。这样，我们还是各自有单独的庭院。妈妈说，那一带都是“老毛子铁路”的“官房”（“公家房子”的意思），想来另两户也是铁路局的职工。东邻有个小女孩子叫黑香，很小很小，猫崽子似的。妈妈后来告诉我，她跟我同岁，那么说，我那会儿也是那么一副德性，至多像个狗崽子。黑香常常在我家院子里跟我一起玩儿，我记不起她是绕道从临街的院门进来的，还是隔开我们的那道高栅栏上有洞，可以钻来钻去。

那天晚上灯光昏暗，一位我不认识的阿姨跑到我家来。她脱下厚厚的皮外套，里边是白大褂儿。姥姥把我扯进我的小屋，不许我出去。我觉得家里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事，心中很不安。后来听见妈妈大声哭叫，我着急了，想冲出去看。可是姥姥按住房门，对我说，穿白大褂儿的阿姨要给我打针，咱们还是藏在



这儿吧。我给吓住了，又不明白：妈妈打针，也拼命哭叫吗？

第二天，我看见妈妈身边有个红脸的小娃娃正安安静静地睡觉，感到十分奇怪。妈妈笑着告诉我，这是弟弟。我问妈妈，弟弟是从哪儿来的？妈妈说，那位阿姨送来的呀，没见过她提着个圆铁盒子？

我看见那个圆铁盒子了，电镀的，很亮很亮，上面还有好些小洞洞。我在院子的草地抓到蚂蚱，放在纸盒子里，姥姥就用锥子在盒盖上扎许多小洞洞，说这样蚂蚱就不会憋死。装弟弟的那个闪光的圆铁盒子上有洞，估计也是怕弟弟会憋死才扎的，我想。

那个红脸的小娃娃就是幼忱。他比我小四岁，就是说，他出生的时候，我应该是四岁。怎么四岁了还那么傻？难道我从来就没看出妈妈的肚子很大？然后妈妈的肚子忽然又变小了，也没引起我注意？反正，我当时对妈妈的话深信不疑，认定弟弟是用那只电镀的圆铁盒子送来的。我自己呢，不用说，也是用那东西送来的。后来我在医院里看见那东西，还得意地炫耀自己的知识，对妈妈说，看，那是给人家送小孩子用的！

最初的记忆太深刻，我对人的来源这样一种认识一直持续到将近八岁的时候。那时我家早已离开海关街四十号，流亡到关内第一站——傍依大海的秦皇岛。

爸爸租了“劳工里”三号孙大爷（记得他叫孙宝元）的一间小屋，劳工里在“道南”，紧挨着将这座小城分割成南北两部分的铁路大干线。它是由两幢黄色石块砌就的低矮二层楼房和中间的一条狭巷组成的，楼里住的全是贫困的码头工人。三号靠近劳工里巷口北端，走出去就能看见一座大仓库和一大片堆积如山的原木。谁也想不到，那座仓库里居然还藏着一所小学。

爸爸也把我送进了那所小学。想起来怪好玩的：大仓库里有一半地方堆放着水泥袋子、木板、煤，另一半排列着四组桌椅，分别属于一至四年级百十来号学生。每逢上课，值班老师亲自举起大铜铃，使劲摇动，四个年级的学生就纷纷就坐。四位老师一齐走到前边，各自给本年级的学生讲课。为了使自己的学生不被别的老师吸引过去，四位老师都拼命提高嗓门儿。假如走进一位参观者，他一定会被这场面逗得笑弯了腰。但老师和学生都习惯了，谁也不觉得可笑。

仓库外面一大堆一大堆的原木就是我们课间休息的游戏场。不过，它也属于劳工里大多数没有钱入学的“野孩子”。他们白天提着小篮子剥树皮，傍晚时分就在那上面疯跑。我跟他们打得火热，一放学就混到一起。

一个傍晚，我们捉迷藏，玩“打仗”，后来累得跑不动了，几个人坐在自己用巨大的原木盖的“城堡”里胡吹牛。一个大些的孩子说：“你们知不知道人是怎么来的？哈！”接着他就神秘兮兮地讲起来。他说人是从娘肚子里爬出来的，还讲了那是因为小虫子钻进了肚子。最骇人听闻的部分是那只小虫子怎么跑进了肚子的。

不能说他的生理卫生课讲得很科学，很准确，但它肯定比用电镀圆盒子送来的要科学得多。爸爸妈妈从来没给我讲过，很会讲故事的姥姥也没给我讲过。我们大仓库小学的尹老师也只讲“天亮了”（语文课本第一课全文），“弟弟妹妹快起床”（第二课全文），绝不涉及弟弟妹妹是从哪儿来的。我从此知道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真是“人不可貌相”，我的第一位性知识启蒙老师，竟是个边讲边把流出来的大鼻涕吸回去的“野孩子”。